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共产主义 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超越

王玲玲, 刘衍诚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哲学共产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形式之一,出现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德国,莫泽斯·赫斯是其创始人。其学理依据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深受哲学共产主义的影响,最终,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通过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深刻批判和清算,完成了从哲学共产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超越。

关键词: 哲学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超越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3)06-0043-07

Marx and Engels' Transcendence From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to Scientific Communism

WANG Lingling, LIU Yanche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i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forms of utopian communism, which emerged in Germany in 1840s, and Mozes Hess is its founder.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Hegel'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Feuerbach's humanism. Young Marx and Engel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in their early days. Finally, based on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y completed the transcendence from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to scientific communism through profound criticism and liquid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scientific communism; transcendence

19 世纪上半叶,莫泽斯·赫斯在融合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前身。哲学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之异化的消除和人之本质的复归。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两个转变”期间,一度深受赫斯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哲学共产主义思想,但最终在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过程中与哲学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立场,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

收稿日期:2023-04-16

基金项目:2022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以伟大建党精神培育高职院校时代新人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编号: SZZX22040)

作者简介:王玲玲(1956—),女,江西永新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衍诚(1990—),男,江西赣州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析,揭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对赫斯哲学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彻底地批判和清算。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证和阐释了科学共产主义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消除阶级和贫富差距,实现人人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诠释科学共产主义内涵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发展趋势、实现方式、依靠力量。由此,通过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走向了科学共产主义。

一、哲学共产主义及其局限性

在《马克思主义大辞典》中,哲学共产主义是“哲学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哲学共产主义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其创始人是莫泽斯·赫斯,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卡尔·格律恩和海尔曼·泽米西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哲学共产主义以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中的“类”本质为其内核,认为宽泛意义上无差别的“爱”是人之本质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共产主义是人之抽象本质的体现。显然,哲学共产主义无视人之本质的社会性,否认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反对革命运动^{[1]379-380}的局限性是非常显著的。

赫斯在青年黑格尔派期间,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异化学说”^{[2]115}融入法国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哲学共产主义。作为哲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赫斯在《行动的哲学》《人类的神圣历史》《欧洲三头政治》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在《人类的神圣历史》中,他把共产主义比作神的天堂,强调“那里只居住着幸福勤劳的人们,他们将过着人所应享受的那种生活。那时将为了消灭贫穷而去寻找贫穷”^{[3]82}。赫斯“始终没有离开费尔巴哈哲学这块基地并转变为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奠基人”^{[4]32}。

哲学共产主义把可以带来“劳动与享受的统一”^{[5]73}的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逻辑结论”^{[4]31}。这样的共产主义因其抽象人性论的学理基础,最终成了充饥“画饼”而势必走向不切实际的空想。现实中,以利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获得资本和私有财产,并以此占用人类的生产力,使之“变成金钱崇拜的个人利己的财富”^{[6]100}。在一个以极端利己作为存在和发展前提的私有社会,人之异化本质的复归何以实现?这样的私有资本何以可能使“人类的生活”成为“理想”的“合作”关系?何以从此走向可以带来“劳动与享受的统一”^{[5]73}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哲学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内涵的论证,因为逻辑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的双重缺失,注定了它的空想特性。

(一) 哲学共产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理论上,哲学共产主义是“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一种扩展”^{[6]100}。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认为,上帝不过是人之“类本质”的映照。在他那里,人的“类本质”集中体现为理智、意志、博爱,上帝所谓的全知全能和博爱是人将自己的“类本质”神化的结果。这一结果就是人之本质的异化。显然,“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类本质”臆想出来的幻影,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产物。然而,神学家们反过来想尽各种方法力图论证想象中上帝的真实性。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产生的本质和根源,揭露了宗教不过是人之本质异化的结果,这是他的贡献。但他从生物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人之本质,将人的本质视为与低等动物种群和其他物种相区别的“类”本质,视为人之生物本能的体现,由此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沿用了费尔巴哈“类本质”和异化的概念分析人的本质,撇开人的社会性,强调“自然界始终只是关心自我生产,关心维持类生活……的生命活动”^{[7]144},因而“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7]143}。“类”借助现实的人表现出来,在天国中的“类存在物即上帝生活在个体之外”^{[5]187}。因此,个体只有在天国中才能得到永生。可见,哲学共产主义从抽象人性的基础上探索人之本质的回归,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客观现实,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纯哲学思辨原则的实现,把抽象的“人”看成是本质的东西,把精神的思考当成是人的全部活动,忽视了人之活动对象的社会性和客观性。

(二) 哲学共产主义是立足于纯粹道德诉求的空想共产主义

哲学共产主义以抽象人性为基点,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形式,认为社会弊病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中利己主义本性决定的。资本的雇佣劳动把人的自由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进而使享受与劳动处在对立之中,充分体现了利己主义的非道德性质。由于利己主义只爱自己不爱

他人,从而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哲学共产主义想要以此说明导致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与社会关系无关,只与个体“类本质”相关的纯粹道德问题,以此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以道德“博爱”为旨归的理论设想提供学理依据。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赫斯那里,未来社会的美好景象是人“生活在爱之中”^{[5]216},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天国——异化消除后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带来的劳动与享受的统一。共产主义行动是“道德完善化过程”^{[3]83},这是“合乎人的本质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社会”^{[7]45}。赫斯所谓的“道德完善”,是没有阶级对立,没有阶级斗争,没有社会革命,仅凭纯粹的人性之爱便可实现的。显然,把“博爱”当成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良药,当成实现共产主义现实路径的纯思辨设想,因其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只能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

基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哲学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的实现视为哲学与伦理学的逻辑结论,“用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的矛盾”^{[2]116}替代私有制的内部矛盾,不了解资本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区别,没有揭露劳动异化产生的真正原因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没有看到现实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不了解也无法解释异化劳动形成的社会原因和现实逻辑。由此,将人之本质的回归和私有制的消灭以及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寄希望于抽象的理论论证和善良的道德启蒙,最终导致哲学共产主义走向空想。

(三) 哲学共产主义是诉诸贫困平等的无政府主义

哲学共产主义主张以无政府主义消除人之本质的异化。无政府主义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赫斯说,“施泰因^①从巴贝夫^②开始叙述。这种最初形式的共产主义是直接长裤汉主义产生的。因此,巴贝夫关注的平等是长裤汉式^③的平等、贫困的平等”^{[7]119}。所谓“贫困的平等”,旨在消除一切欲望,废除财富和艺术,甚至摧毁城市。即,无政府主义的“否定一切统治……从而也破坏一切实在”^{[7]100}。这样的“平等是以消极的方法,即必须通过灭绝任何欲望而达到”^{[7]119}。然而“这种形式最贫乏的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否定一切学问……而不得不直接变成实践的”^{[7]120}“行动哲学”。这里所谓的“行动哲学”并非科学实践观,而是人之自由精神的“行动”。在哲学共产主义那里,唯有“行动哲学”才能使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融合,并通过消灭国家的方式消灭利己主义,以实现哪怕是集体贫困的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在此,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基础,为后者的实现确定了绝对自由的原则;后者则是前者得以实现的结果。哲学共产主义企图通过确定共产主义绝对平等和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之间的逻辑联系,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是对共产主义平等的补充这一理论假设寻找逻辑依据。显然,哲学共产主义与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以及贫困平等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具有根脉上的渊源关系,其空想色彩是鲜明和突出的。试图通过无政府主义实现绝对自由和平等的哲学共产主义,用否定一切文明和进步,以集体贫困等极低水平的平等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的,最终只能将共产主义引入彻底的贫困和社会的倒退。

(四) 哲学共产主义是德国精神贵族的意识形态

哲学共产主义不是把共产主义看成无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而是看成“人类更高的精神动机的产物”^{[8]182}。赫斯在批评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时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的对立消失了,精神自由成为真正唯一的享受,因此,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来源于有教养的阶级。他说“在法国,人道主义的代表是无产阶级,而在德国,人道主义的代表是精神贵族。”^{[8]183}这使得他特别崇尚德国的精英共产主义并反对用暴力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此,哲学共产主义者完全看不到无

① 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是德国社会哲学家,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巴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施泰因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撰写了《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传播。

② 巴贝夫(Francois Emile Babeuf, 1760—1797)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巴贝夫受卢梭的影响,主张财产绝对平等。18世纪末,由巴贝夫及其支持者组建的巴贝夫派试图以密谋的方式,组织工人、农民进行武装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把政治革命看成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斗,并提出建立“平等”“自由”和“以劳动为基础”的“平等共和国”。

③ “长裤汉派”也称之为“无套裤汉派”,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城市平民大都身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讥讽称呼,但后来演绎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词。长裤汉主要成员是城市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其他劳动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的一个派别。他们是城市革命的主力军,是大革命中几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他们虽不构成统一的阶级,但在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国、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必然联系,更不了解蕴藏在先进生产力中的巨大革命力量。结果,无论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多么振振有词,最终也只能止步于理论上丰满、现实中骨感的境地。而且,即便是其理论,也在哲学立场上否定甚至抛弃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是将“精神贵族”意识形态作为哲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内涵,这种否定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共产主义不可能走向科学共产主义。

二、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印记

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的转向中,不难发现,他们从青年时期对赫斯哲学共产主义的认同甚至与之合作转向后来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批判,说明他们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曾受到哲学共产主义的影响”^{[4]30}。对此,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也说过,“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9]4}。这里所说的“著作”包括了赫斯哲学共产主义的相关著作。可见,哲学共产主义是他们“世界观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变过程中所使用的特定的概念”^{[4]38}。从青年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之本质的复归思想,到青年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认同、质疑、批判和清算,既说明了赫斯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更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一) 青年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

马克思不是天生的科学共产主义者,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及其政治立场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过程。他“从激进民主主义到哲学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是其对理想社会进行“理性思辨”的提升^{[10]34}。在《莱茵报》至《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逐渐脱离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立场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问题,实现了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政治立场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最初,青年马克思在对人类解放目标进行逻辑论证时,与哲学共产主义具有不少一致性的地方。赫斯在《行动哲学》和《论货币的本质》等著作中,基于哲学形而上的抽象视域,强调了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的观点。在赫斯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早期也主要是从哲学形而上的视角理解人类解放的理论逻辑,在探索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解放的方式时,他说“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18}。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借鉴了哲学共产主义关于“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5]65}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不等于宗教解放。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此进一步阐释了宗教解放是人类解放“初步实现”的思想。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受哲学共产主义纯粹理性思辨方法的影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尝试着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论证通过消灭私有制,以实现共产主义的逻辑依据。在确立了“哲学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基础上^[12],他分析了哲学原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阐述了通过消除异化追求人类解放的思想。此后,他“从哲学原则出发来思考共产主义所代表的利益”“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并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13]。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之本质从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个人实现人之本质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9]77-78}。在此,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目标的哲学论证,显而易见地带有哲学共产主义论证逻辑的痕迹。

同时,青年马克思还深受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不仅是“实体性的平台”,即“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也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所面对的各种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实现人的真正本质^[14]。法国的唯物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15]167-168}。在此,“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在受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异化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用来阐释哲学共产主义的特殊概念。哲学共产主义和“真正的人道主义”都是建立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都试图揭示人之本质的异化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然而,将克服异化当成实现共产主义必经之路的所谓“真正的人道主义”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

(二) 青年恩格斯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痕迹

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样经历了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在其早期关于共产主义论述的著作中带有明显的“赫斯”痕迹。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以下简称《进展》)中,青年恩格斯分析了哲学共产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基础,进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哲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赫斯的肯定和赞誉。他赞扬道“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16]591},捍卫了一个“共产主

义的党……德国引以自豪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党”^{[16]588}。这时,恩格斯不仅认为赫斯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把自己当成是哲学党的成员之一;不仅接受了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甚至力图找到论证哲学共产主义必然发生的“健全的哲学原理”基础^{[16]591}。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最初认同甚至对赫斯的欣赏,反映了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成熟性,以及哲学共产主义对他的影响之大。

然而,当工业革命的发展成为英国“社会发展的动力”^{[16]674}时,恩格斯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残酷现状,开始意识到哲学原则与社会现实、理性思辨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17]15},也意识到离开经济利益空谈哲学原则,不仅无法真正了解社会现实,更无法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是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这时的恩格斯开始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认识到无论是阶级之间还是党派之间,所有“哲学原则”的冲突都不过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认识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16]650}。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在此,恩格斯看到了“现实的人”的主体作用,也看到了人的历史活动和工业技术对推动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决定作用。

此后,恩格斯开始从现实社会的经济根源和生产关系方面理解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革命性,理解共产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实现方式和依靠力量,也开始逐渐脱离哲学共产主义的纯思辨原则去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最初的反思和批判。此时的批判虽然距离以唯物史观理解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段距离,但却为后来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立场上根本超越哲学共产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且有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也预示着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最终清算必将超越哲学共产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终形成是对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哲学共产主义超越的必然结果。当然,对哲学共产主义的超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革命实践中的理论探索逐步实现的。早期的“人本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18]。人本共产主义立足于抽象人性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从“感性的人”出发,以人道主义批判社会现状,把标志着共产主义社会人之本质的实现看成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以人之本质的复归诠释共产主义。正是基于抽象人性论,哲学共产主义从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抽象人性和人之“类”本质的角度理解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并主张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对私有观念的扬弃来实现共产主义。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受哲学共产主义影响颇深,但他们始终以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哲学共产主义。在探索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内涵、实现方式、依靠力量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哲学共产主义阶段,而是在从“提升理性思辨”到“终结思辨体系”的反思中,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共产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进程^{[10]37}。他们通过对私有制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探索,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根源和现实依据。在《形态》中,他们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1]539}。《宣言》发表后,他们用科学共产主义代替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用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代替了对人本质复归的逻辑抽象。他们从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出发,批判了哲学共产主义纯粹理性的逻辑演绎方法,及其抽象人性论的世界观立场。在深刻批判哲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哲学共产主义的彻底清算和理论超越,构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一)从世界观立场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立场,以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抽象思辨性

哲学共产主义以哲学原则为出发点,而科学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9]30-31}。当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思辨终止的地方”出发时,发现了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并通过对现实中的“人”进行的深度思考和剖析,发现了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人之本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他们在对形成于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之本质的研究中,揭示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与哲学共产主义“博爱的人”的抽象性和梦幻性,辩证地分析了人之本质形成的现实社会基础,并得出结论:人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

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的体现^{[19]200}。人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制约了政治和思想等其他的社会关系,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诠释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之社会属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及哲学共产主义“博爱”的人。显然,对费尔巴哈“类本质”的批判就是对哲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完成了对哲学共产主义以哲学原则为出发点的抽象思辨性的超越。

(二)从实现目标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以批判私有财产为切入点,明确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要素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之前提的思想

针对哲学共产主义试图从抽象人性的视角寻找人之本质的复归路径及其标榜的“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20]58},揭示了哲学共产主义脱离社会现实的虚幻性和空想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在揭示了人之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本的剥削本性,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导致了人之本质的异化。因此,要使人本质回归人本身,就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0]45},消灭私有财产不是剥夺无产阶级挣得的私有财产,而是要废除具有剥削性质的私有财产。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论证了私有制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但又相对不足”的结果^[21],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私有制的消灭意味着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基础被根除,阶级压迫将不存在。无产阶级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把资产阶级消灭了,也终将消灭无产阶级自身,阶级将彻底消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53}

(三)从依靠力量上看,在对哲学共产主义的依靠力量进行反思和批判时,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

哲学共产主义者们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理念的实现,进而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和“精英”身上,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找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主体。对此,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分析了机器大工业时期无产阶级的形成和革命性,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发现了无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并得出结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是机器大工业造成的一个十分赤贫又不能消灭的群体,无产阶级因为生活贫困必然会走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无产阶级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其革命性必然带来生产关系向更高水平的变革。针对哲学共产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企图用“博爱”的说教去唤醒资产阶级良知的思想,就可以发现“哲学共产主义不过是用抽象的哲学议论,去反映着消灭私有制的愿望”^{[21]116}。面对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无产阶级还之以暴力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主体力量的思想,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理论探索和贡献。

(四)从实现方式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哲学共产主义模糊阶级对立的幻想,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和手段,必须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哲学共产主义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维护私有财产,远离政治革命,反对工人运动,通过全社会的“博爱”和道德完善,实现“合乎人的本质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社会”^{[5]45}。对此,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22]48},暴力革命是工人阶级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出路”^{[15]548}。“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1]676},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才有可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3]861},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作为“掘墓人”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改变工人现状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唯此,才能迅速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彻底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差别和贫困,解放全人类。

(五)从历史规律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揭示了科学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看到了私有制中隐藏着的生产领域的三种矛盾。一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私有制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者自身的分裂,劳动产品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加剧了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爆发。二是私有制和竞争的矛盾。依附于私有制而产生的竞争必然产生恶性循环,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竞争就不可能消除。三是竞争与经济危机的矛盾。竞争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引发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些矛盾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变更而导致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把私有制推向灭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析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超越了哲学共产主义从道德原则出发论证共产主义必然性的思想,为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奠定了经济学基础。进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基本规律,指出每一种社会形态向下一社会形态递进时,生产关系都将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按照这样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最终无法驾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终将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必然结果。

综上,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立场,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深刻揭露了哲学共产主义脱离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在“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太空”^{[20]58} 诠释哲学共产主义的空想性质,进而揭示了“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指明了彻底消灭私有制,消除“三大差别”,“建立自由人联合体”^[24]的理想目标、依靠力量、实现方式,完成了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清算和超越,最终形成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 [1]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7.
- [2]赵仲英.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3]黄楠森,靳辉明,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 [4]祝大征,王卫国,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疑难问题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5]陈东英.赫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6]罗伯特·C.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M].刘钰森,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 [7]赫斯.赫斯精粹[M].邓习议,编译,方向红,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8]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8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9]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刘同舫.马克思的哲学立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鲁克俭.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哲学共产主义的确立[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4):41-50.
- [13]王金福,庄友刚.从“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转变[J].哲学研究,2006(11):23-28.
- [14]张奎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J].哲学研究,2003(4):35-39.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7]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4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8]李红波.也谈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转变[J].广东社会科学,2008(4):65-69.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耿步健.论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182-185.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王力.《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贡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3-7.

(责任编辑:韩桥生)